

公正世界信念的文化差异*

吴佩君 李 晔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武汉 430079)

摘 要 公正世界信念的文化差异是该领域较少关注的研究方向,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公正世界信念的水平、功能和测量工具存在文化差异,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文化因素、自我概念、认知方式和不公平的社会现实。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提高公正世界信念跨文化比较准确性的途径和文化影响公正世界信念的机制。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入探讨文化对公正世界信念功能的影响,推进公正世界信念的本土化研究。

关键词 公正世界信念;文化差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Lerner 和 Miller (1978)提出了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 简称 BJW)的概念:人们需要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的世界。这种世界是公正的信念,使个体有能力面对复杂的物理和社会环境,关注长远目标,并遵循社会规范行事。

近半个世纪以来,公正世界信念领域的主要关注点包括公正世界信念的结构和测量(Lipkus, Dalbert, & Siegler, 1996; Maes & Schmitt, 1999; Lucas, Zhdanova, & Alexander, 2011),以及公正世界信念的功能。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在现实或认知层面重建公正(Murray, Spadafore, & McIntosh, 2005);(2)保持主观幸福感和维持心理健康(Fatima & Suhail, 2010; Xie, Liu, & Gan, 2011);(3)追求长远目标(Hafer, Bègue, Choma, & Dempsey, 2005);(4)对不公正的社会现状进行合理化(Beierlein, Werner, Preiser, & Wermuth, 2011)。

已有研究认为,公正世界信念是一种较稳定

的个人特质(Faccenda & Pantaléon, 2011),在不同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Correia, Batista 和 Lima (2009)探讨了公正世界信念与主观幸福感的两个维度(情感维度、认知维度)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公正世界信念与短暂的情绪状态不存在关系,但与稳定的认知维度——生活满意度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公正世界信念是一种较稳定的个人特质。关于公正世界信念发挥功能的作用机制,目前有三种研究假设:个人资源(personal resource)假设、心理缓冲(psychological buffer)假设、对不公正的社会现状进行合理化的假设,前两个假设认为公正世界信念有促进心理健康的功能,第三个假设则认为公正世界信念具有社会功能。首先,个人资源的假设认为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一种个人倾向起作用,个体的个人资源越强大,就能越好地应对生活中遇到的问题。Dzuka 和 Dalbert (2006)认为在不同的文化中,虽然公正推理的过程不同,但是公正世界信念都作为一种个人资源起着促进心理健康的作用。然后,作为心理缓冲的假设意味着公正世界信念在事件与结果之间起调节作用,其功能的实现是有条件的(Correia, Kamble, & Dalbert, 2009)。最后,对不公正的社会现状进行合理化的假设认为个体对公正世界信念的支持具有社会价值,符合社会规范(Alves & Correia, 2008, 2010a)。因此,当遇到与公正世界信念相违背的例证时(比如贫富差距、种族

收稿日期: 2014-01-27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YJAXLX0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171094)。

通讯作者: 李晔, E-mail: liye@mail.ccun.edu.cn

歧视), 个体倾向于认为处于不利处境的人是得其
所应得, 从而将不公正的社会现状合理化。

人格特质有相当的内容是个体或群体受特殊
社会文化环境塑造的结果(范为桥, 张妙清, 张建
新, 张树辉, 2011)。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一种稳定的
个人特质, 一方面受个人需要和经验的影响, 另
一方面受共享的国家、群体经验的影响(Fasel &
Spini, 2010)。Furnham (2003)认为, 当前公正世界
信念跨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 (1)证明研究结
果在不同国家的可重复性; (2)对量表进行翻译,
发现、解释研究结果的独特性; (3)不同国家间的
公正世界信念比较。其中, 不同国家间的公正世
界信念比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比较。因此,
本文将根据公正世界信念的文化差异研究, 分析
公正世界信念在不同文化下的水平、功能和测量
工具有什么差异, 影响公正世界信念文化差异的
因素有哪些。

2 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的文化差异

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的文化差异指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们在公正世界信念量表上的得分差异。公
正世界信念水平与不同的文化维度存在不同程度
的相关, 具有不同亚文化背景的群体在公正世界
信念量表上的得分也存在显著差异。

2.1 公正世界信念水平在不同文化维度上的差异

Furnham (1993)认为公正世界信念和独裁主
义、保守主义、新教工作伦理具有系统的、理论
的、可预测的相关, 而独裁主义等思想在不同的
文化中具有系统差异。因此, Furnham (1993)预测
公正世界信念在文化层面上也存在差异。根据
Hofstede (1980)提出的 4 个文化维度(权利距离、
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
化), Furnham (1993)采用公正世界量表对 12 个国
家的国民施测, 结果表明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与权
利距离、个人主义呈显著相关, 与不确定性规避
呈较弱的负相关, 与男性化呈较弱的正相关。其
中, 权力距离与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不公正世界
信念水平的正相关最为显著。在印度和南非这两
个财富、权利差距悬殊的国家中, 高社会经济地
位的群体持有高公正世界信念, 低社会经济地位
的群体具有高不公正世界信念。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是决定个体心理和行
为的最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

正世界信念研究, 几乎都选取这一文化维度进
行比较。Lipkus 等(1996)根据公正所指向的对象,
提出了个人公正世界信念(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和一般公正世界信念(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即相信世界对我来讲是
公正的, 而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则是相信世界对其
他人来说是公正的。大量研究表明: 在个人主义
和集体主义两种文化下, 人们的一般公正世界信
念水平和个人公正世界信念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 个体的个人公正世界信
念水平通常是高于一般公正世界信念的 (Lipkus
et al., 1996; Correia, Batista, et al., 2009; Dzuka &
Dalbert, 2006)。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 首
先, 对个人公正世界信念的支持有利于向他人传
递积极的自我形象, 对一般公正世界信念的支持
体现了个体对社会的适应(Alves & Correia, 2008),
在注重个人因素的精英文化中, 更重要的是展现
个体自身的能力和成功。其次, Alves 和 Correia
(2010b)发现, 个体对个人公正世界信念的支持比
对一般公正世界信念的支持得到更高的社会赞许
性评价, 并且个人公正世界信念能更好地对自我
和他人进行区分。再次, Testé 和 Perrin (2013)认为
个体的个人公正世界信念水平越高, 控制感也越
高, 这对个体适应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而一般公
正世界信念与对处境不利人群的冷酷态度有关。
然后, 西方人的自我概念为独立自我, 强调自我
的独特性和追求, 他人和集体处于次要位置
(Triandis, 1989), 因此西方人相信自己会比他人
受到更公正的对待, 这有利于维持个体的心理健
康, 使个体更加认同公正原则, 愿意为长远目标
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后, 个体对个人公正世界信
念的支持程度越高, 越倾向于认为社会系统不仅
仅为整个社会服务, 更是为社会中的个体服务
(Alves & Correia, 2010b), 因此较高水平的个人公
正世界信念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

但是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集体主义文化。中
国被试的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并未低于个人公正世
界信念水平(Wu et al., 2011; 刘长江, 殷晓菲, 赵
然, 2009)。这一研究结果不同于西方, 主要原因在
于: 一方面, 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为互依自我, 强调
自我和他人的和谐共处(Triandis, 1989), 因此一
般公正世界信念水平并未低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
另一方面, 至少在中国, 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与个

体对困境的抱怨有关,一般公正世界信念与个体的心理复原力有关(Wu et al., 2011)。人们减少对自我是否受到公正对待的思考,投入更多的精力来提升心理复原力,有利于人们更有效地应对困境,顺利解决问题。

此外,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中,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对公正世界信念水平有不同的影响。Malahy, Rubinlicht 和 Kaiser (2009)分析了1973年至2006年美国国民的公正世界信念随着收入差距的变化。结果表明,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时,国民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也随之上升。在中国,普通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是贫富差距(张爱莲,黄希庭,2010)。周春燕和郭永玉(2013)对来自不同家庭社会阶层的中国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的家庭社会阶层越低,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也越低。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美国人更加认同公正世界信念,而来自低家庭社会阶层的中国大学生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相对较低。从文化角度来说,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美国是一个精英意识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强调个人因素是最重要的,因此美国人相信只要个人勤奋努力就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从而更加认同公正世界信念(Malahy et al., 2009)。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垂直集体主义国家,具有较明显的等级权力结构,王培刚(2008)认为低社会阶层在现实生活中较多地体验到不公平,不公平感会更强烈。这种持续而强烈的不公平感会逐渐成为对世界的一种稳定认知和期望,导致低社会阶层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相对较低(郭永玉,周春燕,2014)。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财富均平思想根深蒂固。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种财富均平思想可能降低了低社会阶层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第四,与认知方式有关。美国人倾向于内归因和分析性思维,中国人倾向于外归因和整体性思维(侯玉波,朱滢,2002;刘邦惠,彭凯平,2012)。因此,美国人更倾向于将贫富差距归结为个体自身的原因,将不公正的现实进行合理化,接受不公正现状,从而强化了公正世界信念(Malahy et al., 2009)。而中国部分民众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不公正外因造成的,例如:社会偏见和歧视、机会不平等、不合理的经济体制等(怀默霆,2009),当不公正感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公正世界信念(Fasel & Spini,

2010)。

2.2 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的亚文化差异

已有研究表明,不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存在差异,即使在同一文化中,具有不同种族或社会背景的群体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文化的大熔炉,种族杂糅,各种族在文化上都有自己固有的特质。种族文化差异对各种族的公正世界信念产生了影响。Calhoun 和 Cann (1994)发现,白人的个人公正世界信念高于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少数民族的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和一般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Calhoun 和 Cann 认为少数民族生活在一个相对不公正的社会,他们的共享文化经验使其失去了个人控制感,这可能是导致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和一般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不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之一。Hunt (2000)认为过去对公正世界信念的研究只反映了白人的经验世界,忽略了其他种族的公正世界信念。因此,Hunt 比较了美国黑人、拉丁人和白人的公正世界信念。三个族裔的社会经济地位为白人最高,黑人居中,拉丁人最低。结果表明三个族裔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拉丁人、白人、黑人。“白人的公正世界信念高于黑人的公正世界信念”的结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白人作为高地位群体,有更强的动机去认为世界是公正的,从而对高、低地位群体的现状进行合理化;另一方面,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一种信念系统,是以客观存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由于黑人长期遭受种族不平等和歧视,导致公正世界信念水平较低(Hunt, 2000)。

在北爱尔兰,根据民众的宗教信仰分为两类群体:天主教徒、新教徒,天主教徒历来被认为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Glennon, Joseph 和 Hunter (1993)发现天主教徒具有较低的公正世界信念。这一研究结果符合公正世界信念理论的预期。但 Joseph 和 Stringer (1998)没有发现两个群体存在显著的公正世界信念差异。对此,Joseph 和 Stringer 认为,也许是因为北爱尔兰的政治、宗教局势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社会现状的改变对两个群体的公正世界信念产生了影响。因此,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公正世界信念虽然是一种稳定的个人特质,但是也有可能随着社会环境和时间发生变化。

张海钟等人(2012)认为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不仅包括民族跨文化心理学,还包括区域跨文化心理学。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文化结构将中国人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群体。Wu 等人(2011)调查了来自大城市和农村的青少年,结果表明两类群体的一般公正世界信念水平均高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但是与大城市青少年相比,农村青少年的一般公正世界信念显著高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研究者认为造成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贫困地区的青少年长期遭受更多的困难,导致个人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相对较低。而高水平的一般公正世界信念有助于提高心理复原力,使农村青少年面对逆境时有更强的心理调适能力。

3 公正世界信念功能的文化差异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具有保持主观幸福感和维护灾后创伤者心理健康的功能。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和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在保持主观幸福感和维护创伤者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相当,甚至更强。并且,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对不公正现状进行合理化的社会功能在具有不同个人主义倾向和水平集体主义倾向的群体中存在差异。

3.1 公正世界信念功能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中的差异

3.1.1 保持主观幸福感

公正世界信念为个体提供了以有意义的方式解释生活事件的概念框架,从而保持主观幸福感。在个人资源的假设中,大部分研究选取了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的观测变量。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开展的关于公正世界信念与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均表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在保持主观幸福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个人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积极情感越多,消极情感越少。这一结论适合于大学生、老年人、遭受学生暴力的教师、学校欺凌事件的实施者和受害者、在学校遭遇压力的群体等(Correia, Batista, et al., 2009; Correia, Kamble, et al., 2009; Correia & Dalbert, 2007; Dzuka & Dalbert, 2006, 2007; Fatima & Suhail, 2010)。Tomaka 和 Blascovich (1994)的研究表明,被试的公正世界信念越高,在认知和生理反应方面都越倾向于将压力任务感知为一种挑战(而不是一种威胁),并且被试在完

成任务时感知到的压力较低,表现也更好,因此公正世界信念具有调节压力的作用。Dalbert (2002)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证明了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对愤怒情绪具有调节作用,降低了消极情感对个体的不利影响。Bègue 和 Muller (2006)发现个人公正世界信念越高的青少年,在挫折情境中表现出的敌意归因偏差和攻击性越少。

在中国,研究者对“蚁族”、地震灾区民众、农村留守儿童、城市和农村的青少年、成年人等群体的调查均表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和一般公正世界信念都有助于提高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降低消极情感,特别是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蒋奖,王荣,张雯,2013;祝卓宏,吴胜涛,李娟,史占彪,王文忠,2010;吴胜涛,王力,周明洁,王文忠,张建新,2009;张莉,申继亮,2011;Wu et al., 2011)。值得一提的是,吴胜涛等人(2009)发现,中国民众的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和情感幸福在常态下表现为分离的关系,仅仅在面对灾难时存在相关,但生活满意度这一幸福感的认知因素却与一般公正世界信念一直有正向的关联。这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不同。吴胜涛等认为情感幸福是一种私情,公正更多地是一种指向社会的理性诉求,中国人平时的情与理是相分离的,因此常态条件下一般公正世界信念与情感幸福相分离。但在灾难条件下,人们由于无力自保、需要社会帮忙,情感表达和理性诉求建立了短暂的关联。

3.1.2 维护灾后创伤者心理健康

目前,持心理缓冲假设的研究主要探讨公正世界信念对灾后创伤者的心理缓冲和保护作用。Otto, Boos, Dalbert, Schöps 和 Hoyer (2006)对水灾受害者进行调查,发现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与焦虑、抑郁和悲痛呈负相关,即个人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的个体感受到的负面情绪越少。该研究印证了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具有调节和促进心理健康的功能。

中国研究者对汶川地震受灾民众的调查表明,一般公正世界信念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心理复原力,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困境(Wu et al., 2011; 祝卓宏等,2010;吴胜涛等,2009)。Wu 等人(2011)认为道家的“无为思想”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哲学思想对中国人的公正信念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哲学思想使中国人更容易接受不公正事

件,提升了人们的心理复原力,是一种对不公正进行合理化的文化策略。但是 Xie 等人(2011)的研究表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越强的灾后创伤者,抑郁、焦虑程度越低,对未来更有信心。因此,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仍需对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和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在维护灾后创伤者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做进一步的探讨。

3.2 公正世界信念功能的亚文化差异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公正世界信念作为一种指令性社会规范(injunctive social norms),具有对现状进行合理化的社会价值(Alves & Correia, 2008),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诸如种族歧视、贫富差距等不公正事件。Beierlein 等人(2011)探讨了公正世界信念和对不公正现状进行合理化的关系,发现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越高,对不公正的社会现状进行合理化的倾向越强,且集体政治效能感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这种对不公正现状进行合理化的社会价值以社会赞许性(social desirability)和社会效用(social utility)来评估(Alves & Correia, 2008)。中、高水平的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和一般公正世界信念都是符合社会规范的,个体对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和一般公正世界信念的支持程度越高,他人给予个体更高的社会赞许性和社会效用评价(Alves & Correia, 2010a, 2010b)。

Testé 和 Perrin (2013)发现,具有较高个人主义倾向和较高水平集体主义倾向的人们持有较高的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具有较高个人主义倾向和较低水平集体主义倾向的人们持有较高的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并且,个人主义在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对社会效用的作用上具有中介作用,水平集体主义在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对社会赞许性的作用上具有中介作用。因此,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由于具有较高个人主义倾向和较高水平集体主义倾向、具有较高个人主义倾向和较低水平集体主义倾向的两类群体对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和一般公正世界信念的支持程度不同,导致公正世界信念对不公正现状进行合理化的社会功能存在亚文化差异。

4 跨文化背景下公正世界信念测量工具的使用

目前,国内外学者都编制了相应的测量工具。由于公正世界信念及其子概念存在文化差异,

因此研究者应该关注具体的测量内容、工具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4.1 内在-终极公正量表的文化差异

Maes 和 Schmitt (1999)从时间维度将公正世界信念分为内在公正(Immanent Justice)和终极公正(Ultimate Justice),并编制了内在公正量表和终极公正量表。杜建政、祝振兵和李兴琨(2007)编制了中国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量表。该量表包括三个因素:终极公正、内在公正、内在不公正。

在西方文化中,内在公正是个体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否公正的判断,即公正和不公正是同一维度的两极,相信世界是公正的个体,就不会认为世界是不公正的。在中国,个体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否公正的判断却可以分为“内在公正”和“内在不公正”两个维度。黄光国认为,西方文化强调“普遍性的爱”,每个人都应该遵守一种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因此公正和不公正是单一维度的两极;而我国文化强调“差序性的爱”,主张个体在不同的情景下采取不同的行为标准来进行是非判断,因此,中国人对“内在公正”和“内在不公正”的认知便可以分离开来(引自杜建政等, 2007)。

4.2 公正世界量表在西方文化中的适用性

Rubin 和 Peplau (1973)编制了第一个测量工具——公正世界量表(Just World Scale, JWS),该量表是单一维度的。虽然许多研究采用了 JWS,但是 JWS 的因素结构、信度、研究结果一直遭到质疑(Hafer & Begue, 2005)。Whatley (1993)认为种族和文化在 JWS 的因素结构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JWS 需要包含能代表美国文化的多种族样本,才能准确判断其适用性。Whatley 用 JWS 测试了不同种族的美国人,结果表明公正世界信念是多维的。Caputi (2000)也认为公正世界信念量表的适用性受到文化的影响, Caputi 同样采用 JWS 对澳大利亚学生施测,发现公正世界信念包含 5 个因素。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文化对公正世界信念测量工具的因素结构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即使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由于不同国家和种族存在亚文化差异,量表的适用性也可能会降低。因此,在测量公正世界信念时,首先应该考虑量表的文化适应性,才能真正达到研究目的。

5 小结与展望

虽然公正世界信念是一种稳定的个人特质,

但是公正世界信念的水平、功能和测量工具存在文化差异。Furnham (1993, 2003)认为公正世界信念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公正世界信念帮助人们应对引起不公平感的事件,这种应对威胁事件的共享经验使人们发展出对现实的共识,这种共识被保留并传递给后代。正如文中所提及的,影响公正世界信念文化差异的因素主要包括:1)社会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思想;2)个体的认知方式:归因倾向、思维方式;3)自我概念;4)不公平的社会现实,该因素更多的是导致公正世界信念的亚文化差异(例如种族差异、城乡差异)。关于公正世界信念与文化的关系,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1)提高公正世界信念测量的有效性与文化等值性。目前,公正世界信念的跨文化比较主要是量表测量结果的比较,而量表主导的测量方式还存在因素结构不同、跨文化等值性差等问题。国内研究主要直接翻译使用西方的量表,或对西方的量表进行修订。这些测量结果也许仅表明中国被试对西方测量工具的反应,难以揭示中国人的公正世界信念是否有结构上的独特性。因此,一方面需要从中国的社会、文化、历史出发,采用文献分析法、深度访谈法、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等方法来研究中国人公正世界信念的内涵和因素结构,编制适合中国人的量表。另一方面,对所采用的测量工具进行分析,探讨是否存在具有文化偏差的条目及其原因,提高公正世界信念测量的跨文化等值性。

(2)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进行跨文化比较。自我报告的问卷法易受社会赞许性、实验者效应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测量的结果可能是认知加工后的反应。但目前还鲜见以实验法等其他方法进行的比较研究,因此方法的多样化也是这一领域值得探索的方向。比如,借鉴内隐认知的方法,以反应时、情感反应强度等作为衡量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的标准,从而有效地屏蔽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再如,统计方法的多样化。目前公正世界信念领域采用的数据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方差分析、分层回归分析。梁觉和周帆(2010)指出,多层线性模型、多层结构方程模型等新的数据分析方法,能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更复杂、精密的数据分析。因此,公正世界信念领域也应尝试这些新的统计方法,提高跨文化比较的准确性。

(3)探讨文化如何影响公正世界信念的形成。

现有的跨文化研究主要是对不同文化的样本施测,比较不同文化下被试的异同,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明确的解释。但是,公正世界信念发展方面的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关于公正世界信念在个体毕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主要有两种观点:1) Furnham (2003)认为公正世界信念在个体的一生中是相对稳定的,是一种有利于心理健康的应对机制, Oppenheimer (2005)对荷兰青少年的调查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2) Oppenheimer (2006)认为公正世界信念是一种公正动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丧失其重要性,并被更复杂的道德和公正推理过程所取代,从而使个体更好地应对无序、不公的世界。此外, Oppenheimer (2006)发现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和垂直集体主义存在正相关,并且个体的不公正经历对维持公正世界信念有重要作用。基于已有研究,文化影响公正世界信念的机制应该是:公正世界信念在个体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双向作用中形成和发展。首先,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普遍存在的公正动机逐渐转变成公正世界信念。在青少年时期,随着个体认知能力的成熟和社会化,对公正世界信念的需要和认可程度可能会有所变化,但之后便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然后,由于个体所处环境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思想等社会文化因素作用于个体,使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的公正世界信念存在差异。最后,个体的人格特质和经历对公正世界信念也有一定影响,从而形成了既有某一文化的普遍特征又有个体差异的公正世界信念。这仅仅是初步的假设,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4)公正世界信念功能的跨文化研究。在公正世界信念理论提出的最初 30 年,西方研究者将公正世界信念视为一种基本动机,观察个体对无辜受害者的反应。近 20 年来,大多数研究将公正世界信念视为一种稳定的个体差异变量,探讨公正世界信念和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的关系。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公正世界信念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的维持和促进功能。鉴于西方国家和中国在公正世界信念领域的研究现状,公正世界信念的跨文化比较主要局限于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保持主观幸福感和维护心理健康功能的比较。由于文化差异对社会认知具有重要影响,因

此未来的研究需要拓展公正世界信念功能的跨文化比较。

(5)公正世界信念的本土化研究。在西方,公正世界信念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目前,我国对中国人公正世界信念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西方的理论基础上,采用西方的研究思路,验证西方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为了推进中国公正世界信念的本土化研究,一方面需要关注公正世界信念在个人主义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异,探索适合于我国文化的独立综合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可以将公正世界信念的研究应用于对我国现实问题的解释与探讨。

参考文献

- 杜建政, 祝振兵, 李兴琨. (2007). 大学生公正世界信念量表的初步编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5(3), 239-241.
- 范为桥, 张妙清, 张建新, 张树辉. (2011). 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人格研究: CPAI 及其跨文化应用. *心理学报*, 43(12), 1418-1429.
- 郭永玉, 周春燕. (2014). 公正世界信念对低社会阶层的双重作用.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40(1), 63-67.
- 怀默霆. (2009).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 *社会学研究*, (1), 96-120.
- 侯玉波, 朱滢. (2002). 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心理学报*, 34(1), 106-111.
- 蒋奖, 王荣, 张雯. (2013). “蚁族”群体的公正世界信念与幸福感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9(2), 208-213.
- 刘邦惠, 彭凯平. (2012). 跨文化的实证法学研究: 文化心理学的挑战与贡献. *心理学报*, 44(3), 413-426.
- 刘长江, 殷晓菲, 赵然. (2009). 青少年公正世界信念发展特点研究.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32(6), 138-141.
- 梁觉, 周帆. (2010). 跨文化研究方法的回顾及展望. *心理学报*, 42(1), 41-47.
- 王培刚. (2008). 当前各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状况的动态认知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 (6), 115-122.
- 吴胜涛, 王力, 周明洁, 王文忠, 张建新. (2009). 灾区民众的公正观与幸福感及其与非灾区的比较. *心理科学进展*, 17(3), 579-587.
- 周春燕, 郭永玉. (2013). 家庭社会阶层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4), 636-640.
- 张爱莲, 黄希庭. (2010). 从国内有关研究看经济状况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18(7), 1068-1072.
- 张海钟, 姜永志, 赵文进, 安桂花, 张小龙, 胡志军, 张万里. (2012). 中国区域跨文化心理学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0(8), 1229-1236.
- 张莉, 申继亮. (2011). 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与公正世界信念的关系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 (6), 78-88.
- 祝卓宏, 吴胜涛, 李娟, 史占彪, 王文忠. (2010). 地震灾区教师的公正观与满意度.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8(1), 79-81.
- Alves, H., & Correia, I. (2008). On the normativity of expressing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Empirical evidence.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1(1), 106-118.
- Alves, H., & Correia, I. (2010a). Personal and 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s judgement no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3), 221-231.
- Alves, H., & Correia, I. (2010b). The strategic expression of 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European Psychologist*, 15(3), 202-210.
- Bègue, L., & Muller, D. (2006).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s moderator of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5(1), 117-126.
- Beierlein, C., Werner, C. S., Preiser, S., & Wermuth, S. (2011). Are just-world beliefs compatible with justifying inequality? Collective political efficacy as a moderator.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4(3), 278-296.
- Caputi, P. (2000).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just world scale among Australian undergraduat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4(4), 475-482.
- Correia, I., Batista, M. T., & Lima, M. L. (2009). Does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bring happiness? Causal relationships among belief in a just world, life satisfaction and mood.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1(4), 220-227.
- Calhoun, L. G., & Cann, A. (1994). Differences in assumptions about a just world: Ethnicity and point of view.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4(6), 765-770.
- Correia, I., & Dalbert, C. (2007). Belief in a just world, justice concerns, and well-being at Portuguese schools.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2(4), 421-437.
- Correia, I., Kamble, S. V., & Dalbert, C. (2009).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well-being of bullies, victims and defenders: A study with Portuguese and Indian students. *Anxiety, Stress, & Coping*, 22(5), 497-508.
- Dalbert, C. (2002). Beliefs in a just world as a buffer against anger.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5(2), 123-145.
- Dzuka, J., & Dalbert, C. (2006).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old age. *Aging and Mental Health*, 10(5), 439-444.
- Dzuka, J., & Dalbert, C. (2007). Student violence against teachers: Teachers' well-being and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European Psychologist*, 12(4), 253-260.
- Furnham, A. (1993). Just world beliefs in twelve societi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3(3), 317-329.
- Furnham, A. (200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Research

- progress over the past decad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4(5), 795–817.
- Faccenda, L., & Pantaléon, N. (2011).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nsitivity to injustic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belief in a just world.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40(4), 491–511.
- Fasel, R., & Spini, D. (2010). Effects of victimization on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in four ex-Yugoslavian countri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3(1), 17–36.
- Fatima, I., & Suhail, K. (2010).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Mothers of normal and Down syndrome 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6), 461–468.
- Glennon, F., Joseph, S., & Hunter, J. A. (1993). Just world beliefs in unjust societies: Northern Ireland.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3(4), 591–592.
-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unt, M. O. (2000). Status, religion, and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Comparing African Americans, Latinos, and Whit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1(1), 325–343.
- Hafer, C. L., & Begue, L. (2005).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just-world theory: Problems,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1(1), 128–167.
- Hafer, C. L., Bègue, L., Choma, B. L., & Dempsey, J. L. (2005).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commitment to long-term deserved outcom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8(4), 429–444.
- Joseph, S., & Stringer, M. (1998). Just world beliefs in Northern Ireland.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8(2), 263–264.
- Lipkus, I. M., Dalbert, C., & Siegler, I. C. (1996). The importance of distinguishing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for self versus for others: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2(7), 666–677.
- Lerner, M. J., & Miller, D. T. (1978). Just world research and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Looking back and ahead.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5(5), 1030–1051.
- Lucas, T., Zhdanova, L., & Alexander, S. (2011). Procedural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beliefs for self and others: Assessment of a four-facto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model. *Journal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2(1), 14–25.
- Malahy, L. W., Rubinlicht, M. A., & Kaiser, C. R. (2009). Justifying inequality: A cross-temporal investigation of US income disparities and just-world beliefs from 1973 to 2006.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2(4), 369–383.
- Maes, J., & Schmitt, M. (1999). More on ultimate and immanent justice: Results from the research project “Justice as a problem within reunified Germany”.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2(2), 65–78.
- Murray, J. D., Spadafore, J. A., & McIntosh, W. D. (2005).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ocial perception: Evidence for automatic activation.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5(1), 35–48.
- Oppenheimer, L. (2005). Justice and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8(8), 1793–1803.
- Oppenheimer, L. (2006).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ubjective perceptions of society: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9(4), 655–669.
- Otto, K., Boos, A., Dalbert, C., Schöps, D., & Hoyer, J. (2006). Posttraumatic symptom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of flood victims: The impact of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0(5), 1075–1084.
- Rubin, Z., & Peplau, A. (197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actions to another's lot: A study of participants in the national draft lotter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9(4), 73–93.
- Triandis, H. C. (1989). The self and social behavior in differing cultural contexts. *Psychological Review*, 96(3), 506–520.
- Tomaka, J., & Blascovich, J. (1994). Effects of justice beliefs on cognitive appraisal of and subjective 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potential str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4), 732–740.
- Testé, B., & Perrin, S. (2013). The impact of endorsing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on social judgments: The social utility and social desirability of just-world beliefs for self and for others. *Social Psychology*, 44(3), 209–218.
- Whatley, M. A. (199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 Unidimensional or multidimensional?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3(4), 547–551.
- Wu, M. S., Yan, X. D., Zhou, C., Chen, Y. W., Li, J., Zhu, Z. H., ... Han, B. X. (2011). 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silience: Evidence from a collectivistic cul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5(6), 431–442.
- Xie, X., Liu, H., & Gan, Y. (2011). Belief in a just world when encountering the 5/12 Wenchuan earthquak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3(4), 566–586.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WU Peijun; LI Ye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CCNU), 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Hubei Province,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hardly concerned in the field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However, this topic also ha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s. In this paper,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levels, functions, and measurements of belief in a just word are described and its causes are also analyze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include sociocultural factors, self-concept, cognitive styles and unfair social reality. Moreov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roaches which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and the mechanism of how culture influences this belief.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further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focus on how culture influences functions of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s well as carries forward the localization studies of the belief.

Key words: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